

鲁迅研究资料

鲁迅研究资料

目 录

宋庆龄致鲁迅信	1
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及其他	2
夏衍关于“左联”一些情况的回忆	8
任白戈谈“左联”和“左联”东京支部及其他	13
林焕平谈“左联”的组织 and 活动以及“左联”东京支盟的情况	18
欧阳山谈“左联”和“小说家座谈会”等	23
小说家座谈会第一次记录(摘要)	26
周钢鸣谈“左联”的有关情况	28
白曙谈“左联”和“左联”诗歌小组等	33
任钧谈“左联”和“中国诗歌会”的一些情况	39
赵铭彝谈剧联成立等情况	43
林淡秋谈“左联”末期有关情况	49
夏衍谈“左联”解散事及其他	51
访问肖三同志记录	54
肖三给“左联”的信	58
周扬谈正确地评价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的历史	64
周扬：《“国防文学”》	78
周立波谈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一些情况	80
周立波：《关于“国防文学”》	83
艾芜谈“左联”和两个口号论争的一些情况	84
何家槐给鲁迅的两封信	90

吴奚如谈两个口号论争、鲁迅和党的关系、文艺大众化的一些情况·····	97
巴金谈《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他·····	102
关于周文同志和三十年代“左联”活动的一些情况·····	104
魏猛克谈1934年4月鲁迅给他的两封信及“左联”东京支部的情况·····	110
冯雪峰谈同28年至36年之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有关的一些零碎的参考资料·····	114
徐懋庸：《我和“左联”鲁迅周扬的关系的始终》(摘)·····	129
《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摘录)·····	137
茅盾关于鲁迅电贺长征胜利事的情况介绍·····	139
陈望道谈大众语运动·····	141
乐嗣炳谈“大众语”运动和鲁迅先生·····	143
有关大众语讨论的文章目录·····	149
聂绀弩谈“大众语”、“旧形式的采用”的讨论及《海燕》停刊事·····	161
胡愈之谈“大众语”讨论和《译文》停刊事·····	164
黄源谈《译文》停刊的经过·····	167
肖军谈《译文》、《作家》、《海燕》和《鲁迅先生纪念集》等·····	170
陈企霞谈《无名文艺》月刊·····	176
施蛰存谈《现代》杂志及其他·····	178
陶亢德谈《论语》、《宇宙风》、《人间世》·····	181
韩侍桁谈《星火》杂志及其他·····	183
楼适夷：《毕生难忘的恩情》·····	186
——记鲁迅先生给楼炜春的几封信·····	
王志之谈北平“左联”及鲁迅在北平师大的演讲·····	194
杨霁云谈鲁迅写给他的对联·····	198

俞芳谈鲁迅与阮和森、宋子佩、李秉中·····	199
附：李秉中致鲁迅信·····	201
戈宝权谈《答国际文学社问》·····	202
陈广(卓坤)谈“一八艺社”和木刻运动·····	203
胡一川谈“一八艺社”和木刻运动·····	206
江丰谈“一八艺社”和“春地画会”等·····	210
周金海(立达)谈 MK 木刻社·····	214
周金海(立达)：《鲁迅——革命木刻的播种者》(摘录)·····	216
刘平若(曹白)谈木铃木刻社及其它·····	218
黄新波谈鲁迅与木刻及其他·····	221
李桦谈现代版画会·····	227
金肇野谈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	229
唐诃谈“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前后·····	231
吴似鸿：《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历史经过略谈》·····	234
何白涛的日记摘抄(关于鲁迅举办的木刻展览会)·····	243
上海木刻作者协会成立宣言·····	244
内山嘉吉：《中国初期木刻与我》(摘录)·····	246
鲁迅在日本·····	264
中国对日本研究鲁迅的介绍与评论·····	271
编后说明·····	275

宋庆龄致鲁迅信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的耽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为厌恶入病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全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

痊安

宋庆龄

六月五日

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及其他

大革命失败后，郭老从南昌到香港，后因生病秘密回到上海。鲁迅也从广州经香港到上海。当时许多文化人汇集上海，郭老和我们都感到应该搞个进步作家的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国民党。于是就由蒋光慈和我两人去见鲁迅，建议创造社和鲁迅领导的语丝社等文学团体合作，出版共同刊物。鲁迅高兴地同意了。接着就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鲁迅、郭老都签了名，鲁迅的名字放在第一位。这份联合宣言不是发表在杂志上，那时《创造》月刊等创造社的刊物还时办时停，而是发表在报纸上，可能是《时事新报》。

我们准备与鲁迅联合时，成仿吾还在日本，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他，他不同意。他认为老的作家都不行了，只有把老的统统打倒，才能建立新的普罗文艺。这是受了当时国际共运中左倾思潮的影响。我记得德国的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人当时都比较左，日本也有一个大学教授，名叫福本和夫，曾参加组织日本共产党，很左，当时在日本有很大影响。结果，我们与鲁迅的合作没有搞成，没把停止合作的事通知他。

不久，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等从日本回国，出版《文化批判》，从此创造社、太阳社就发动了对鲁迅的论战。那时郭老已去日本，我也在郭老之后到日本去住了一段时间。由于我在论战以前同鲁迅有过一段接触，在论战中我虽然也有所表现，写了几篇文章，但没有公开攻击。

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开会是经常有的，但我记得没商量过

与鲁迅当面论战的事。创造社与太阳社的性质不一样，创造社在广州时都不是党员，郭老是北伐到武汉时才入党的，后来又失掉关系。成仿吾是在与鲁迅论战后出国时才入党的。其他从日本回来的人在论战时好象也不是党员。创造社当时没有接受谁的领导，是自己活动的。太阳社大部分是党员，当时好象属于闸北支部，由阳翰笙负责，我是在黄埔军校时认识他的。

创造社当时确实出版过《文艺生活》，这是一种小报，象当时上海流行的《晶报》那样大小，也就是说象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小，不一定每天出一期，有时三天或一星期出一期。《文艺生活》名义上是我主编，创造社成员大都写稿，创刊日期已记不起来。总是在成仿吾他们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办了不久就停刊了。鲁迅批判的《文艺生活》上的那篇文章确实是我写的，我当时也确实看到过别人译的《文艺政策》，在鲁迅之前翻译的。所以我在文章中那样写，但到底是谁译的，由什么书店在什么时候出版，现在都记不起来了。

文献书房在创造社还没查封时已创办，是我向一个老朋友搞了一点钱办起来的。地点可能在提篮桥下海庙附近，当时创造社处境已很困难，我办文献书房的目的是准备万一创造社出了事，好有个退路。书店的负责人还有个邱韵铎，这个人抗战期间在四川。文献书房开始自己没有印书，支持创造社。创造社被封后才出版了一些书籍，其中主要是戏剧集，包括霍普特曼和格列高里夫人的作品。由于戏剧集销路不好，书房赔了钱，自己出书后一年多就关门了。

创造社被查封的具体日期我已记不起来，只记得是在阴历年底，可能是1929年2月，文献书房的创办日期大概也在1929年之前吧。创造社被查封，实际上只封了门市部，办公地点没有封，许多书籍的纸版得以保存下来，接着就成立了江南书店，

由朱镜我负责，继续把这些书籍印行出版。

我在创造社中是分工管总务的，创造社的那个咖啡馆就是我经办的，开办时间约在与鲁迅论战期间，名称叫上海咖啡馆，记得开张后去喝咖啡的人很多。当时上海还有一个公啡咖啡馆，好象是外国人开的，左联成立后开会可能就在这个咖啡馆，因为这个地方一般中国人是不去的，外国人对喝咖啡的人又不大注意，比较安全。在我记忆里好象没有在创造社的上海咖啡馆里开过什么会。

关于成立左联，我只知道是通过冯乃超与鲁迅见面商量后才决定成立左联的，至于是谁要冯乃超去与鲁迅联系，我就不清楚了。当时成仿吾已出国，李初梨与彭康也已不再从事文艺活动，他们搞党的地下工作去了。

我自己与党的一些负责人的关系，曾见过李立三、瞿秋白和李富春。总理那时没见过。当时李立三分批召集左翼作家谈话，鲁迅可能也在内。我是和田汉一起去的，在一家旅馆里见到了李立三。谈话内容已无法回忆，只记得总的精神是鼓励我们，要我们继续同国民党斗争，并未提到攻击鲁迅的事。这次谈话是在左联成立以前，这点我还记得很清楚。李富春同志我是在王独清家里见到他的，他俩都是法国留学生，当时好象来往较多，这次见面谈了些什么也已记不起来了。与瞿秋白见面则是在左联成立以后，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在谈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时，总说“我们”与“你们”，瞿秋白看到后认为观点不正确，要找我提出批评，好象是冯雪峰先把瞿的意见告诉我，然后由夏衍带我去见了。他。

自由大同盟的成立时间比左联早，约在1930年2月。是那些人筹备的，我不知道，我是接到别人通知，才赶去参加成立大会的，是谁通知的，也已记不起来。开会地点是公共租界里

的汉口路圣公会，不会是法教堂。成立大会在公共租界里的汉口路召开，这一点我记得比较清楚，而法教堂不会在公共租界，法教堂在法租界，是圣母派的教堂。大会在汉口路圣公会开还有一个证明是这次大会的会址是通过董维健的关系才借到的，而董当时正在圣公会当神父。他就是因为发起组织自由大同盟，不能再当牧师而失业了。成立大会到底是那一天开的，我已记不起来，现在你们查到成立宣言上所署日期是2月15日，大概就是那天吧，你们认为2月15日应该是签名日期，可能是对的。我记得那天到会的人都在宣言上签了名，会后还请了一些人签名，所以宣言发表日期是在2月15日以后。至于开会时间不是下午就是傍晚，可能是下午。

1933年底成仿吾到上海通过鲁迅与党接上关系，我曾参与其事。当时我得到成仿吾到沪要见我的消息后就约他在大世界附近热闹的地方见面，并一起吃饭和到大世界游玩。但我怎么会知道他已到沪，或者他用什么方法通知我他已到沪，我都记不起来了。这次见面的具体日期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天气还不太冷，你们估计大致在阳历十一月，大致不错。就在这次见面时，成仿吾提出要见鲁迅，于是就由我约了鲁迅与成仿吾见面，地点在北四川路底一家饭馆或咖啡馆。见面时在座共四人，即鲁迅、成仿吾、茅盾和我。为什么茅盾也参加了会面？我记得好象是成仿吾带了沈泽民（茅盾之弟）牺牲后的一些遗物给茅盾，你们说沈泽民当时还未牺牲，那么可能是沈泽民托成仿吾带话给茅盾，所以茅盾也来了。这次会面后，鲁迅就替成仿吾接上了党的关系。这次会面与我第一次见到成仿吾相隔时间不会太长，因为他急着要见鲁迅，但具体日期我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刚见面不久，我发现《呐喊》再版时鲁迅把《不周山》这篇小说抽掉了，因为成仿吾以前批评过《呐喊》，说《呐喊》中只有

《不周山》最好。我当时还奇怪为什么两人刚见面，鲁迅就要把《不周山》抽掉呢？

关于“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讨论，我记得出版《春光》的书店好象并不属于左联领导，但《春光》的编辑庄启东是左联成员，所以书店也有可能受左联影响，是左联的外围组织。庄启东好象是太仓人，我当时是认识他的，但别的情况不清楚。我那篇文章中提到的座谈会可能是书店组织的，在我记忆中有十多个人参加了座谈会，具体是哪些人已记不起来，可能就是在《春光》上撰文参加讨论的那些人吧。

这次讨论完全是自发的，我写那两篇文章也是自发的。在我记忆中，周扬、夏衍都没有同我谈起过这次讨论。34年后我去搞电影，与夏衍接触较多，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周扬对这次讨论有什么想法，我也不知道。

当时为什么会提出“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这个问题？因为丁玲被捕后，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左联处境很困难，我们很着急，不知道左翼文艺运动今后怎么办。我就提出左翼作家要敢于写伟大作品，我文章中所说的“勇气”就是指左翼作家要有“勇气”面对白色恐怖，有“勇气”写伟大作品。我所谓的伟大作品是指题材伟大，我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发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作家应该用各种体裁努力表现这些重大事件。伟大作品不单指小说，但确实不包括杂文，对杂文有所不满，认为杂文是随便说说的，这当然是当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其实鲁迅的许多杂文，如《阿金》等都深刻触及了社会问题。不过当时有这种想法的还不止我一个人，所以别人也写了不少文章参加讨论。我当时年轻幼稚，提出这个讨论反映了自己在白色恐怖下有一种急躁情绪，空喊口号，实际上这种伟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鲁迅就比我们老练得多，看问题也深刻得多，我

们远远比不上鲁迅。

我在一二八以后进良友图书公司工作，起先搞翻译，为良友画报写些文章，后来才编《新小说》。《新小说》为什么会停刊？我当时是赞成大众语的，想把《新小说》办成一个通俗的大众化的文艺刊物，出了几期后，我发现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有矛盾，《新小说》上发表的一些作品并不通俗，如鲁迅介绍来的肖军、肖红的作品和金人的译稿有些就不通俗易懂，这样就在编辑上碰到了困难。而且《新小说》销路不好，公司老板对出版这本刊物也不热心，当时林语堂编的《论语》也在良友出版，老板很感兴趣。再加明星电影公司又请夏衍、阿英、洪深和我去当顾问，因此我就停办《新小说》，离开良友去搞电影了。

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十一日

一九七八年五月修改

夏衍关于“左联”一些情况的回忆

我是一九二七年从日本回国的，回国后参加了党，在街道搞工运，没有参加文化工作。不过和太阳社的人（钱杏村、孟超等人）在一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一九二九年筹备左联时，我才从街道调出搞文化工作。一九三二年我又被调去搞电影工作，离开了左联，这以后关于左联的具体情况就知道得不多。

关于筹备左联的情况，现在只能根据记忆来谈，大概是二九年底，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李富春同志同阳翰笙去接谈的（他们在黄埔军校时就认识），大敌当前（国民党、日本），左翼文艺内部不应有相互矛盾，应当组织一个文艺团体，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有人说当时是否是李立三的指导，也可能的，因为那时他是中央宣传部的领导。

这样，考虑了十二人筹备左联，十二人是不错的，但具体名字记不全了，有创造社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有没有朱镜我，就记不清了，太阳社的阿英、洪灵菲、戴平万，其他有冯雪峰，和从街道支部调来的我等。二九年十一、十二月开始筹备，中宣部派来负责联络工作的是潘汉年，筹备的内容一是拟定一个纲领，二是拟定一个发起人名单。特别是纲领，经过了审查修改，二九年底或者三〇年初，纲领拟好后，通过潘汉年去征求过党中央的批准，领导上指示我们去征求鲁迅的意见，我和冯乃超一起去的，到景云里鲁迅家里呢还是内山书店的后面呢，记不明确了。为什么是我们两人去呢，我印象中道理很简单，冯乃超是创造社的，他出面比较好，表示愿意同鲁迅和好，我呢，

在日本时就给“语丝”投过稿，二八年认识了鲁迅，跟鲁迅、语丝、创造社的人都认识，又同太阳社的人一个支部，跟各方面都有联系，但又不属于那一方面。鲁迅看了纲领表示同意。但说过，这种(政治纲领性的)文章我是写不来的，你们写比较好，但对纲领没有说什么意见，当时发起人名单开得很多，不单文艺界，还有戏剧界等，鲁迅看了问冯乃超：“郁达夫为什么没有？”冯乃超说郁达夫现在很消沉，情绪低落，鲁迅不以为然，说，郁达夫还是爱国的，进步的，应该吸收他参加，我们表示同意，这样就把郁达夫也列入了，有些资料上说是郁推荐鲁迅参加左联，完全是错误的。

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现在发表的跟当时讲的有区别，发表时经过修改，原来我还保留了记录稿，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他对纲领原则上同意(他不会轻易表示同意的，我们同他讲过这是党中央同意过的)，但他有忧虑，对上海滩上的漂零子弟，忽左忽右的坏毛病，很不放心，他的讲话是对人对倾向而不是对纲领。他同意左联的纲领，并不等于同意左联的每一个人。那时讲话不象现在照稿念，没有讲稿，之前我们没有商量过，他当时讲得很长，有半个多钟头，这个会一共开了一个下午。

关于纲领中“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口号，是有矛盾的，反对这个，而左联成员本身就是这些人。左联当时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大部分是从斗争第一线退到上海的，如阳翰笙是广州失败后到上海的，洪灵菲、戴平万是潮汕失败后到上海的，钱杏村是武汉失败后到上海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回国的，如冯乃超、李初梨、彭康和我，还有一部分是上海原有的青年作家。当然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纲领也包含有自我批判和进行思想改造的意思。

当时左联的组织机构并不是很严密的，没有委员长一类的职务，据我所知决没有行政书记的职务，党团书记相当于党总支书记，下面党员很多，那时没有党组。左联成立大会时，鲁迅是主席团主席之一，他在左联的领导地位是毫无疑义的，是实际上的领导，但没有名义上的职务，党组织通过党员向他汇报情况。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对外宣传联络的机构，是负责对外宣传等工作的，负责人好象是冯雪峰，后来我也在名义上负责过，还有一个工农兵文化委员会，负责人好象是洪灵菲，后来他担任了闸北区委书记之后就不再管了。

左联很少开大会，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执行委员开会时，也很少请鲁迅参加。当时许多人在一起开会不容易，我记得成立大会之后最大一次是柔石、胡也频、冯铿开了苏维埃区域大会回来后的汇报会议，那是借日本记者俱乐部开的，柔石、胡也频后来专门向鲁迅作过汇报。

鲁迅对当时上海党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做法和作风，曾表示过不满。当时每一个纪念日都要搞游行示威，比如一月二十一日李卜克内西等三人纪念日，三八妇女节，五一节，五五马克思诞辰等等，都要游行示威，每搞一次都有一些人被捕，对于这样的事，现在看来当然有点滑稽。鲁迅对作家中空喊口号没有实际创作，以及文艺评论中的盛气凌人的文风，也都表示过不满，他反对赤膊上阵，给左联写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信等等。自由运动大同盟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严重，没有言论自由，所以要有些社会知名人士参加，象蔡元培、杨杏佛、孙夫人等，鲁迅参加了这个组织，据说还捐过款，但这个组织的集会，他也很少参加。

关于历任党团书记，冯雪峰说的大致不错，中央转移到苏区去后，冯曾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31年瞿秋白到上海，实

际上就是文化界的领导，我认识瞿秋白是冯雪峰介绍的，瞿常到我家里来谈天，办湖风书局以及阿英、郑伯奇和参加电影活动等，是他领导的。

左联成立时推肖三为驻苏联代表，经常联系。一九三一年以后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左联不可避免地受左倾路线的影响。由于此，左联失去了文艺界的许多同路人，郑振铎、叶圣陶都没有参加左联（当然，个人联系还是有的。）

苏汶（杜衡）我记忆中没有参加过左联，如加入那就是冯雪峰的关系。

徐懋庸没有当过行政书记，他什么时候加入左联我不了解，当时他经常接近鲁迅，也写过一些杂文。

太阳社的人基本上都去世了，孟超在七五年阿英在七七年。蒋光慈没有退党，但他很少参加党的集会，当时我一直和他住在一幢房子里，我住在楼上，他住在楼下。

关于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左联的功过，我不想多说，我相信将来总会有正确的评说。左联从一九二九年筹备、三〇年成立，到三六年解散，这七、八年中，是否有左倾关门主义，是否有宗派主义？我认为肯定是有的，主要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左联筹备、成立，正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大家知道，我党过去经验证明，国共合作时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倾向，国共分裂时，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倾向；二、左联成员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都还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世界观没有改造，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特别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很不了解；在革命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的时候，容易产生左倾冒险主义；三、左联成员有不少是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包括我在内，或多或少都受到当时统治日共的福本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四、更重要的是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党

内存在过立三、王明路线统治，上海地下党根本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看不到毛主席的著作。

左联内部，在白色恐怖下，确也有过一些变节、叛变分子，如杨村人、姚蓬子等，后来还有象胡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但是我认为这是极少数，主流还是革命的，人们不会忘记李伟森、胡也频等五烈士，不能忘记洪灵菲、童长荣这样的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也可以说，现在还在世的左联盟员中，经过长期的考验，举不出一个人和林彪、四人帮有牵连。

一九七七年六月廿九日

一九七八年三月 修改

任白戈谈“左联”和“左联”

东京支部及其他

我是1933年夏天参加左联的。

我先是在左联的理论研究委员会。1934年左联改选执委会，秘密投票。鲁迅、茅盾、周扬、夏衍、田汉、周文、胡风、沙汀、艾芜和我等都被选为执行委员。执委会再选举常委。鲁迅任书记，胡风任秘书长，周文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因为鲁迅不能经常出席和主持常委会，左联工作由胡风、周文和我三人共同负责，由胡风向鲁迅先生请示报告。

34年秋，林伯修和田汉代表文委约我谈话。他们说，因为发现胡风和南京方面有联系，要割断胡风同左联的关系，要我当左联秘书长。宣传部工作则由杨潮管，但没有宣传部长的名义（他原是宣传干事）。

周文是住在杨潮家里的。有一天突然不见了，第二天才见面。他对杨潮说，是国民党警察把他抓去了，问不出什么，就把他放了。杨潮立刻把这事情告诉我，我就告诉了田汉。当时就把周文从左联组织部调离，改由宋卢天（王尧山）任左联组织部长。

左联上面是文委、文总领导。文委负责人是林伯修，成员有夏衍、周扬、阳翰笙、田汉。周扬是左联党团书记。

左联组织部下面有四个区委，即法南区委、沪东区委、沪西区委、闸北区委。当时左联盟员有一部分是各大学的文学青